

汉字阐释与文化传统

HANZI CHANSHI YU
WENHUA CHUANTONG

黄德宽 常 森 ©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014034849

H12
52

汉字阐释与文化传统

HANZICHANSHIYU
WENHUACHUANTONG

黄德宽 常 森 著



北航

C1715159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H12
5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字阐释与传统文化 / 黄德宽, 常森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303-16647-3

I. ①汉… II. ①黄… ②常… III. ①汉字—研究 ②中华文化—研究 IV. ①H12 ②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 129412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
电子信箱 gaojiao@bnupg.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55 mm × 235 mm
印 张: 15.5
字 数: 165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策划编辑: 赵月华 责任编辑: 杨 帆
美术编辑: 王齐云 装帧设计: 李尘工作室
责任校对: 李 菡 责任印制: 孙文凯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序

许嘉璐

去年秋，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在合肥举行年会。会下，研究会的理事、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黄德宽先生告诉我，他正和常森合写一本论述《说文》、重新思考对汉字进行阐释的书，就快完稿了，希望我能写一篇序。我想，我们早已是忘年之交，这个任务是推脱不得的；但是说老实话，我心里也在打鼓：近年来关于《说文》的新作已经不少，虽然大多倾注了作者的不少心血，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时见新解，但在观察的视角和整体思路上难得看到有突破性的尝试，黄、常二位的这部新作能不能真的“新”呢？

元旦刚过，科技大学出版社就把书的三校样寄来了，书名曰《汉字阐释与文化传统》。夜阑人静，灯下披览，——只有这个时候我才能专心地读点儿什么——我想，用三个“夜车”总可以把它“开”完了吧。不料，甫一开卷，就不能释手了：新颖的思路，严密的论述，清新的语言，处处洋溢着才气和勇气，像磁石一样吸住了我。冬夜料峭，竟然不觉，读毕“结语”，不禁掩卷而叹，方知东方之将白。我为两位作者而惊喜，更为文字学、《说文》学有了真正新的收获而庆幸。不意我先于世人享此佳作！

我的按捺不住的喜悦是有道理的。

大约十年前，我深感训诂学、文字学到了必须向文化学领域伸展的时候了。传统“小学”原本对文化现象是十分关心的，但是当它向前迈出关键性的一步，比较彻底地离开了经学附庸的地位之后，也就远离了文化。如果说这是学术从综合走

向分析所必须付出的代价，那么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种种就训诂谈训诂，对文化还未及注意的论著，就是振兴这门即将断绝的学科的必经阶段了。但是，传统“小学”产生和发展的土壤原本就是文化，或者说“小学”就是为文化的阐释而生的，而那个时期文化的最集中的记录则是经书。尔后的“小学”与文化的分离实际上是违背了其本有的规律。事实上，“小学”自身也因此而受害了，训诂学的框架和理论基本上还停留在半个多世纪前的格局中，文字学除了考释，和历史学的关系也是若即若离，没有大的变化。“小学”观照文化学，从文化学和广泛的文化现象中吸取营养，同时文化学得到“小学”这一利器的帮助可以挖掘得更深，更接近真实，这种双向的介入和靠拢，或者称之为交叉、渗透，是历史的必然。当然，在同一时间想到这一问题的，绝不只我一人，在此前后不断出现的关于文化与语言关系的著作，就说明学术界对这一问题思考的程度。

鉴于我国语言学研究进展缓慢，我曾认为“大约从乾嘉时代起，语言学家们几乎忘记了哲学，重实证而轻思辨，重感性而轻理性，不善于把实际已普遍使用的科学方法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用认识论去阐释和论证这些方法”，“直到今天，语言学界，特别是训诂学界，偏重考据忽视理论的倾向犹在，懂得哲学，能够沟通哲学与语言学的人很少。这恐怕是我们的语言学难以产生新思想新方法的一个重要内因”（1988）。“实证的语言科学，研究到一定阶段，就会有，也应该有哲学的思辨，并以思辨的结果指导……方法的改进。”“由于文化背景、学术传统的特性，我国的古代的语言学和其他学科一样，一向有重实用、重情景的人文性特点。这样的学术风格和道路，一方面大大促进了文献学的发展，使文化的传承牢固而明晰，另一方面也造成忽视理性思维、缺乏宏观分析的不足。”“与此同时，在哲学家们那里，由于对语言关心和观察得不够，恐怕也妨碍了哲学的深入。”（1995）

在黄德宽、常森的这本书里，既可以随处看到传统“小

学”的光辉——作者深谙个中精意，并言简意赅地使之呈现在读者面前，同时，又再现了原本就存在的许慎与其文化背景之间的辩证关系，深入地开掘了这位伟大的汉字阐释家成功与不足的深层原因，从这里不难感到西方文化学、文化哲学的睿智，作者理性思考的升华。但是作者所写的又的确的确是“中国的”，是实实在在的汉字阐释学——实证和思辨在这里得到了有机结合。我多年来期望出现的研究风气，一朝而得之于此，能不击节叹赏？这种感受，我早就想写出来，写给作者，也写给读者。但是两三个月来我需要全力去对付当代仓颉和许慎给社会和教育所造成的麻烦，竟拖到今天才动笔，这是我要向作者和出版社道歉的。

本书在《说文》学、广义文字学的许多根本问题上都提出了新颖的见解。我觉得最值得注意的是以下几点：

汉字的阐释者实际上不可能不介入汉字的形音义关系，而这种介入又与阐释者身上中国文化的的影响关系至为密切，因而对汉字阐释这一主体行为的研究，应该是科学汉字学和中国文字学史的重要理论命题。汉字和文化传统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日的推移发生着深刻的转变（引申转变、假借转变、强制转变）；淡化汉字作为语言符号的功能，超越或部分地超越汉字跟语言的联系，从而相对独立地观照它时，才能比较完整地把握其自身所蕴涵的文化信息；汉字阐释应以据形考义为核心，以追索汉字与文化的历史联结为目的，以形音义之间的互证互求为中介，阐释过程的基本模式是：文化抉择—具体化—一体悟—证说；许慎的阐释实践最典型地体现了汉字阐释的特色，他的阐释实践（包括错误）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他对汉字的许多重要思想奠定了传统汉字学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是这一理论的终结；许慎的矛盾（实际上也是汉字的传统阐释的矛盾）在于，他既注重从与汉字相关的经验背景中考析汉字，又执著于汉字构形所体现的原初意义，而形义关系又是朦胧的、不完全确定的；早期汉字的具体性、形象性，源于古人特有的文化心理特征……这些观点无论其正确程度和论述深度

如何，我认为都是足以引发人的思考的，因而都是可贵的。第十一章“历史性：汉字阐释的原则”无异于为汉字阐释的历史性原则开了一个很实在而又难以回答的问题单子。如果觉得“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伟大”的说法有点过分的话，那么起码我们应该理解作者殚精竭虑的甘苦，感谢他们为人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

本书之所以获得这样的成就，不是偶然的，是作者的学术基础和治学精神所决定的。

两位作者“出身”于传统“小学”，在文字学领域尤曾下过“死功夫”；同时他们又对学术的发展趋势甚为关注和敏感，这就为他们超越微观、观察宏观做了必要的准备。书中的实证与思辨统一，即出于此。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实在难得很。大概正是因为难吧，所以现在不乏企图省力者，试看坊间一些冠以“文化学”名目的新说新著，可能比此书厚得多，但是比较一下二者真正的分量孰重孰轻，就可以知道此书的两作者当年所下的“死功夫”之可贵。这恐怕对所有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人都有启示的意义，并不限于文字阐释的领域。

关于他们的治学精神，虽然过去我就有所了解，但在实际写这篇序的时候，应该把这种“先入为主”的因素排除掉，只就书论书。这里我只以一事为例。作者对待前人之说，该肯定的肯定，该怀疑的怀疑，不过誉，不轻毁，即使自己并不同意，也不轻易否定，诚所谓阙疑载疑，不立不破。大至对整部《说文》，小至对一个字的阐释，此道一以贯之。例如作者说：《说文》最典型地体现了汉字阐释的特色，许慎有关汉字的许多重要思想，在尔后两千年的文字学研究史中，还没有什么人真正地超越他；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说文》几乎从一开始就成了传统文字学理论的终结。又如作者认为，《说文》的有些说解，虽然业经古文字证明是错误的，但是错也自有其错的道理，是许慎所承接的文化传统的产物，有其必然，其中也有一定的理论内涵。这与那种以今傲古、藐视《说文》的态度相去何遥。又如对段玉裁在“秃”字下的注释，作者认为是

多想象之词，但是同时也承认他所提供的经验背景却比王育所说的具有更明显的一般性，暗含了接近事实真相的巨大可能。……这些都表现出作者是在努力从历史的沉积物中精心提炼出一切于今于后有益的东西，而不随便扔掉，这是负责任的文化传承者才有的胸怀，同时也只有把目光扩大到文化背景并深入把握贯穿于历史进程中的哲理才能做到。

此书当然并非尽善尽美。例如，汉字所固有的构形理据既难于确知，如何才能使阐释者的感悟不致误导其阐释行为？作者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矛盾，但是并没有提出实在的解决方法，虽然已经概括了汉字阐释过程的基本模式。又如，有些章节和段落给我以言犹未尽的感觉，是作者尚未思考成熟，还是还未及发现其间更深层的问题？当然，我们不应该要求问题的提出者同时拿出答案，我之所以点出这一点，是寄厚望于作者下一阶段的研究，祝他们在这方面再有可观的收获。

对书中所提到的一些具体问题，也有我不敢苟同之处。例如对《说文解字叙》中“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和“甘”字说解中的“一，道也”的理解；“美”字释为“从大从羊”和“𪛗”属被赋予不祥义的文化背景；“甲”“乙”二字的说解是否矛盾；以及把训诂学定义为古代词义学，等等。但是，这都属于见仁见智的范围，并非本书的瑕疵。我想，如果作者能对所据的例证做多角度的思考，或者可以收获更多。

1995年4月15日 于日读一卷书屋

再版前言^①

晚清以来，西学东渐，中国传统学术受到了严峻的挑战，面临着存亡危机。随着西方学术影响的日渐扩大，中国现代语言学研究基本上实现了脱胎换骨的重建，自觉或不自觉地抛弃了中国语文学的研究传统。在这个历程中，尽管也有许多学者思考并尝试建立符合汉语言文字实际的语言学研究方法和学科体系，但是，中国语言学研究实际上却始终无法走出对西方语言学研究的模仿和照搬。^②

以《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为代表的传统中国文字学也不例外，随着现代语言学的传入，一些文字学者试图摆脱《说文》影响而创立新说，有的人甚至奉西学为神明，无知地否定和批判《说文》和传统文字学。

随着中国学术的发展和进步，近来一些学者深入反思和重新估价中国语言研究的传统和现状，呼吁“以我国语言学的优良传统为根源，取西方以及其他地区的语言学精华而融通之，坚定地走自主创新之路，为建设创新型的中国语言学而奋斗！”^③就文字学研究而言，重新估价传统甚至可以说就是重新认识《说文》，就是再次发现《说文》的潜在价值，并启发我们寻求建构适合汉字实际的研究方法和理论。

1

① 本前言曾以《回归传统与学术创新——“汉字阐释学”论略》为题，刊登于《古汉语研究》2011年第2期。这里略加修改作为本书再版前言，或许有助于读者进一步了解著者对相关问题的新的思考。

② 参阅王力：《中国语言学史》，第四章“西学东渐时期”，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③ 鲁国尧：《语言学文集：考证、义理、辞章》，6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该书所收《“徐通锵难题”之“徐解”和“鲁解”》《“振大汉之天声”》《学思录：说“文史语言学”》诸文皆可参看。

我们认为，作为汉字研究的经典性著作，《说文》博大精深，蕴涵丰富，对中国传统文字学的影响至深且远。^①但是，许慎的一些重要的文字学思想及其价值至今尚没有被后人充分认识到，有待当代学者进一步去发掘和弘扬。我们提出汉字阐释问题，就是试图回归传统文字学，从传统中汲取学术创新的营养，探索建立适合中国语言学研究的独特理论和方法。

在汉字教学与研究过程中，汉字的阐释问题实际上是汉字研究的核心问题。无论是教学还是研究，对汉字的认知和解释，既是起点也是终点。认知汉字的形音义并做出合理的解释，是学习者、教学者和研究者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最终要解决的问题。

汉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学习者在汉字习得过程中，逐步认知汉字的各种属性（形、音、义），从而达到了解汉字知识并学会书写和应用汉字。这是一般意义上的汉字认知过程，也就是汉字习得的过程。对普通的语言文字学习者来说，学会运用也就达到了目的。

教学者为实现教学目标，必须尽可能地对汉字的各种属性给出合理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建立在研究者对汉字阐释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涉及汉字研究中的阐释问题。

汉字的阐释实际包含两个不同层次：一是为一般汉字习得者更好学习汉字，对汉字属性做出必要的解释，比如汉字教学过程中的字形分析、字音描写和字义解说。二是对汉字属性形成的原由予以揭示并做出解释和说明，其目的是要阐明汉字构形的“所以然”，比如汉字形体来源、音义关系的分析等，这种分析往往涉及汉字构形的功能及其文化蕴涵。

汉字阐释牵涉的问题相当复杂，面对数量巨大、内容庞杂的汉字体系，阐释者如何分析解释，影响汉字阐释的要素有哪些，应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和方法，如何有效建立汉字与其产生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的联系，历代汉字阐释的成果如何甄别，

^① 参阅黄德宽、陈秉新：《汉语文字学史（增订本）》，一至三编有关章节，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能否建立科学的汉字阐释模式，诸如此类，都需要进行深入的专门探讨。

《说文》可以说是汉字阐释的百科全书式著作，书中不仅对所收全部汉字的形音义及其构造意蕴进行了力所能及的阐释，而且许慎阐释汉字的理论、方法和经验，决定了长期以来中国文字学研究汉字的基本方式和方向，确立了汉字阐释的基本模式和传统，同时也为建立现代汉字阐释学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下面我们看一个例子，《说文》卷一“王”字：

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

对“王”的解释体现了许慎说文解字的基本方法和目标追求，也包含了他的汉字阐释思想。“天下所归往”说的是“王”的读音来源，即“王”的读音源自“天下所归往”的“往”；“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这段文字是要阐释“王”字为何写成“三横画一竖画”，说的是“王”的构形意蕴，即字形构造的理据。比较一下现在通行的权威工具书，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工具书只是注明“王”字的读音和字义，一般不再说明其读音的来源和构形的理据，也就是说现在基本上放弃了《说文》的释字传统。即便如此，汉字教学和研究过程中，却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因此，关于“王”的解释，一直是学者所关注的问题，后来也提出了不少新说，如王字从火（旺）说、象王冠说、象人端拱而坐说、象牡器之形说，现在大家比较赞成吴其昌、林沅“象斧钺形”的说法。^①

上举新说，虽然多不同意许慎对“王”的阐释甚至超越了许慎，但是在方法上，则依然继承了《说文》开创的汉字阐释

① 参阅于省吾主编：《甲骨文诂林》，3270～327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6。

传统，那就是从特定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出发，通过分析汉字构形及其蕴涵的文化要素，来揭示汉字构造和发展与中国文化的深层关系，从而阐释汉字构形的理据、特点和规律。这种汉字阐释的方法，已突破汉字作为记录语言符号系统的层次，将汉字阐释从语言层面上升到与历史文化的研究相结合的层面，我们曾将具有这类特征的汉字阐释称作“汉字的文化阐释”。^①提出“汉字的文化阐释”，是试图继承和发扬《说文》汉字阐释的传统，发掘《说文》所具有的当代学术意义和重要价值。我们认为，对“汉字的文化阐释”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可以尝试建立汉字研究的专门之学——“汉字阐释学”。现代意义的汉字阐释学，应该是一门跨越语言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和思想文化史等不同学科的交叉边缘学科。

从汉字的文化阐释到汉字阐释学的提出，并不是我们要标新立异，而是文字学研究的必然要求；将许慎及其《说文》与建立汉字阐释学联系起来，也不是我们要抱残守缺、盲目推崇古人，而是《说文》及其奠定的文字学传统确实蕴涵着重大理论价值和文字学研究创新的元素。

近年来，汉字的研究、教学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国的建立更是促进了汉语汉字在海外的广泛传播。如果我们全面考察汉字教学和研究的实际情况，尤其是关于汉字文化或汉字与中国文化关系的各种观点，对汉字与传统文化的误读误解可谓比比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汉字阐释的混乱，给学习者、教学者带来不少困惑，也使人们对汉语文字学的科学性有所质疑。这种状况的出现，表明现代文字学理论和成果还不能适应当前汉字教学和研究的需要，建构真正能够科学解释汉字与中国文化关系的新的理论学说，对当前的汉字研究和教学都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因此，我们认为，借鉴许慎的汉字阐释成果，发掘《说文》和传统文字学蕴藏的文字学理论遗产，在此基础上建立科学的汉字阐释学，是汉字研究适应

^① 黄德宽：《关于汉字的文化阐释》，语言文字与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台中，东海大学中文系，2008。

时代要求的新拓展。

《说文》作为传统文字学的经典著作，对建立汉字阐释学提供的借鉴，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说文》对汉字功能和属性的认识，奠定了建立汉字阐释学的认识论基础。许慎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① 这种认识，一方面与现代语言学对文字功用的认识完全一致，即文字符号系统通过记录语言，从而突破有声语言的时空局限，“传于异地，流于异时”，实现“垂后”“识古”的功效；另一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许慎将文字提高到“经艺之本，王政之始”的高度，认为文字是“经艺”和“王政”的本始，具有根本性、决定性的作用，这就为他阐释文字的文化内涵奠定了认识论基础。从这种认识出发，他对《说文》这部书的作用也就有了明确的定位，那就是“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万物咸睹，靡不兼载”^②。他的观点和研究实践，尤其符合汉字这种自源性文字体系，是对汉字与中国文化关系的自觉体认。只有准确认识汉字与它赖以产生、发展的文化背景的深层联系，揭明汉字与传统文化的依存关系，才能发展出真正适应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文字体系的阐释理论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将许慎看作汉字阐释理论的奠基者是毫不为过的。

其二，《说文》确立了汉字阐释学必须坚持的历史性原则。确立汉字的历史发展观是正确考察汉字并实现对汉字科学阐释的基本原则，这在今天是一个常识问题。^③ 因为汉字经历了产生、发展、变革等各个发展阶段，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生的汉字现象，其蕴涵的文化信息是有差别的，对其正确阐释必须是建立在对这种历史发展的正确认识之上的。但是，许慎所处的时代，对汉字的历史发展认识并不

① （汉）许慎：《说文叙》。

② 同上。

③ 黄德宽、常森：《历史性：汉字阐释的原则》，载《人文杂志》，1996（2）。

清晰，比如对待重新发现的古文，“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许慎批评“诸生竞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①从《说文叙》这些记录可以看出，当时对汉字的历史发展面貌世人多不知晓，甚至对“古文”这种字形的存在都表示怀疑，基本上没有建立起汉字的历史发展观。许慎《说文叙》则清晰地描述了文字的生成和发展，他认为：文字起始于庖牺氏“始作八卦”、神农氏“结绳为治”，黄帝之史仓颉“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其后形声相益”，“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到周宣王有太史籀大篆，春秋之后“诸侯力政”，“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于是书同文字，颁行小篆；“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这个描述，是当时对汉字发生、发展史认识最完整的记录，就今天的认识而言，也基本符合汉字产生和发展的实际情况，这证明当时许慎已经确立了汉字历史发展的正确观点。正是这种观点的确立，才保证了他的汉字阐释研究能坚持历史性原则，经得起时代的考验。

其三，《说文》发展了汉字阐释的理论和方法，使对汉字的系统阐释成为可能。许慎撰写《说文》一书，对汉字系统的构造进行了深入研究，揭示了作为符号的汉字体系的内在系统性，发明了汉字 540 部首，将全部汉字“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牵条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②。《说文》构建的汉字系统揭示了汉字形音义的内在联系性，使数以万计的汉字变得有规律可循。在汉字的构造方面，许慎认为汉字的构形是由“依类象形”再到“形声相益”而“孳乳浸多”的，他发展和丰富了“六书”理论，这为“说文解字”提供了基本理论和方法，并一直影响着中国文字学对汉字结构的分析。以今天

① （汉）许慎：《说文叙》。

② 同上。

的眼光来看，可以说汉字符号系统性的揭明和构形方式的总结，为汉字阐释确立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其四，《说文》的汉字阐释实践，为汉字阐释学的建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据《说文叙》记录，《说文》共收列 9353 字，重文 1163，解说性文字达 133441 字。这是对当时所使用汉字和流传的籀文、古文、或体、奇字的全面整理，是一部皇皇巨著。《说文》对所收文字的阐释，体现了他的汉字阐释思想，内容极为丰富。其子许冲《上〈说文〉表》，称《说文》“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艸木，鸟兽虫鱼，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说文》不仅收录宏富，关键是许慎“引而伸之，以究万原”，阐释了每个字的形音义，进行了一次汉字阐释的伟大实践。今天看来，无论他的阐释正确与否，对汉字阐释学的建立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样本价值。许慎阐释汉字所体现的认知过程、阐释模式、遵循原则和基本方法及其对汉字与文化背景关系的梳理，影响和启迪了历代学者的汉字阐释行为，这些学者中有许多成就卓著，如南唐徐锴，清代段玉裁、王筠、桂馥、朱骏声等。历代的汉字阐释产生了大量有价值的成果，为建立汉字阐释学做了较为充分的资料积累和理论准备，而这一切又都是建立在《说文》基础之上的。

基于以上几点，我们认为从发掘《说文》蕴涵的汉字阐释成果入手，弘扬许慎汉字阐释的理论和思想，探索建立科学的汉字阐释学，以适应当代汉字教学和研究的需要，是当前文字学研究创新的一条可能路径。

在建立现代汉字阐释学的视野下，我们重新认识和揭示了《说文》这部巨著的重大价值，这也是对中国语言文字学传统的自觉回归。当然，这种回归不是简单地复古，而是在现代语言文字学的理论维度上对传统学术价值的再发现。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汉字阐释学的建立，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通过对汉字阐释传统的继承和合理要素的发掘，充分利用当代文字学，特别是古文字学研究的新成

果，吸收考古学、历史学、思想文化史等学科领域的营养，立足《说文》而又有所超越和发展。

首先，要进一步理清汉字阐释涉及的基本要素和主要环节。汉字阐释是一个复杂的主体行为过程，涉及阐释对象、阐释主体和阐释过程，这是构成汉字阐释的三个基本要素。

第一个基本要素是“阐释对象”，也就是历代汉字。汉字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和文化信息的载体，汉字蕴涵的文化要素既有本源性的，也有历代发展演变过程中附加上的，异常丰富而复杂。当前对历代汉字，尤其是先秦汉字面貌的认识，已远远超过许慎，我们所见到新出的甲骨文、青铜器铭文、战国文字资料，许慎都无缘见到，对历代汉字的发展演变我们的认识也更为清晰。因此，我们要借鉴许慎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回答许慎试图解决而由于时代和资料的局限无法解决的问题，包括纠正当时背景下所难以避免的错误。

第二个基本要素是“阐释主体”，也就是汉字的阐释者（解释者）。汉字的阐释者既是汉字文化阐释的实施者，同时又是一定文化的创造物，其阐释行为模式和认知范式总是取决于他所接受的文化传统、一定时期文化背景的影响以及个人生长的文化环境。在这一点上，今天的学者比起许慎有许多优势也有很大局限。许慎去古未远，沉浸于当时的文化情境之中去体味汉字的一点一画，这是今天的学者永远也无法企及的。时代相去越远的阐释者，与阐释对象之间的疏离越是难以弥合，阐释者总是难以摆脱其时代的局限和对远古的蒙昧无知。

第三个基本要素是“阐释过程”。汉字阐释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主体心智活动，从阐释对象的确定、认知，到对汉字文化要素的揭示，并进一步予以证说，从而得到正确的结论，这个过程严密、复杂、艰难，而且充满歧途。因为，汉字自身不能证说自己而且情况复杂，中国文化又博大无比，其内涵及其变化更是气象万千，一个汉字到底在哪一个层面以何种方式与一种文化现象发生内在联系，往往是很难做出简单的判断的。故此，汉字阐释的过程就显得十分复杂和充满风险，这个过程最

终决定着阐释的成败。

近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估价，使得汉字文化研究再次引起学者的重视。但是，由于阐释者对汉字文化的简单化理解以及中国文化和汉字知识的积累所限，致使各种似是而非甚至错谬百出的阐释触目皆是。这也从一个方面表明汉字阐释的复杂性和艰难性。即便是训练有素、学识渊博的文字学家，也难以保证自身所做的阐释就是准确无误的，历代学者在这方面更是留下了许多教训。

其次，在认识到汉字阐释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同时，要将《说文》阐释汉字的经验进一步上升到科学的理论。汉字阐释作为一个非常复杂的主体行为过程，尽管因阐释者的差异存在着种种不同，但是阐释者也遵循着基本的阐释模式^①。当阐释者面对阐释的汉字时，总是试图调动其全部知识，对汉字的构形及其文化内涵做出合理的解释和证说。我们认为，排除阐释者由于所处时代、个人文化积累和背景不同而形成的差异，大体可以概括出汉字阐释的一般模式，这一点在相关论文和本书中，我们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①为此，我们建立了汉字阐释模式所涉及的“文化诱导”“文化抉择”“具体化”“体悟”和“证说”5个概念范畴，本书对这些概念范畴进行了具体限定，并指出它们构成了汉字阐释完整的模式化过程，虽然并非每个汉字的阐释都机械地遵循全部的阐释环节，但是哪怕最简单的阐释也不会违背各个范畴的实质，否则，就会走向歧途。汉字阐释的模式只是对汉字阐释的主体行为过程和阐释方式的概括。所有的汉字阐释几乎都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这种模式。但是，即使认识到这种模式也不能保证阐释结论就必然正确。许慎为代表的传统汉字阐释及后人对汉字的种种“误读”，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镜鉴。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建立科学的汉字阐释学，需要进一步深化对《说文》所遵循的历史性原则的认识。这一原则不仅应

^① 黄德宽、常森：《汉字阐释与文化传统》，载《学术界》，1995（1）。